

试论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

黄 继 宗

郑观应(1842—192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振兴实业、以实业为后盾与西国进行商战的“商战论”,他的要求改变中国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英国式民主代议制的“议院论”等反映时代要求的见解,为近代史家所迭书。但对他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以救国的启蒙教育思想则少有论述。本文试对郑观应这方面的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教育救国的权舆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各种救弊方案纷纷被提了出来,如“借材异域”,创办新式企业以致富;练兵制器,巩固边圉以致强等。郑观应则认为借材异域、练兵制器固然重要,倘不抓住教育、培养人才这个根本关键,那就等于舍本求末,还是达不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①教育救国思想是郑观应维新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不积极发展教育,“育才于学堂”,其恶果首先是权自外操。即使在各处创设各样制造、织造、开矿、轮船等局,也“无不为外人要挟愚弄,大受其亏”。^②其次是,国家没有自己的科技人才,不仅无法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只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下,拾取别人的“蔗渣”“穷日咀嚼”^③永远落伍。他根据国际经验指出:“近世反弱为强之国,莫捷于德、日”,其练兵制器和发展商务,“莫不从教育来,故均一蹴而为世界之强国。”^④所以他反复强调:“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⑤

郑观应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抑或是教育方法,都必须以西方为楷模进行改革,学习先进的西学。他指出,学西学、办洋务乃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时务”,是“救时弊”的“对症”良药,^⑥他批驳那些“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而自命为“正人”者流,为见“君父之有危疾”不“百计求医”让其死亡的乱臣贼子,^⑦是“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⑧的腐朽分子。殊不知西学乃西方“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

- ① 郑观应:《致伍秩庸先生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七五页。
- ②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 ③ 郑观应:《交涉》附录《中西交涉损益论》,《盛世危言》五卷本卷二,第十四页。[以下《盛世危言》五卷本简称为《盛世危言》(5),《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简称为《盛世危言》(14),《盛世危言》八卷本简称为《盛世危言》(8)]
- ④ 郑观应:《上戴少怀尚书书》,《盛世危言后编》卷四第三二页。
- ⑤ 郑观应:《学校》附论,《盛世危言》(14)卷一,第二六页。
- ⑥ 郑观应:《西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学术二,原学下。
- ⑦ 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5)卷一,第十二页。
- ⑧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5)卷一,第六页。

之”^①的宝贵知识,取来我用,是赶上先进的一个捷径。因此,他把拒绝西学的顽固派喻为别人把明珠送来,“我乃按剑疾视,拒之而不受”的蠢驴。他之所以对西学有如此的认识,除救国热忱之外,还因为具有前进的历史观。他认为:“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②当时缅甸、越南之所以沦为殖民地附属国,就是因为不能顺应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唯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生存、富强,否则将有被淘汰的危险。

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七十年代资产阶级的兴起,学习西方的风气也日益开展。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云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③但在这“西学大兴”的时刻,郑观应却敏锐地看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他针对某些人在向西方学习时,“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④,把西学“诧为巧不可阶”的东西,从而丧失学好西学的信心与勇气的情况,满怀民族自豪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并不亚于别人,张衡的“浑天之制”,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祖冲之的“不因风力施机”的“千里船”,在当时也是“各树神奇”“惊人耳目”的。西学尽管造诣“精深”,但只要学者“运以精心,持以定力”,是可以学到和学好的。他预期: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最终“何难驾出西人而上之哉”!^⑤无疑,这是对信心不足者的一种鼓舞,对那些“推崇过当”,从而丧失民族自信心者的一种针砭。

郑观应认为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虽好新学,但不得新学之益。”^⑥他指出,当时学习西学的情况,或浅尝辄止,或泛鹜而不专,或得其皮毛而未悉实济,甚至有“袭西俗

之奢靡淫佚,籍以表文明之外观”^⑦者。有些人“自以为已经熟悉洋务,足为新学中人”,但究其所学实未掌握西学的真谛。这无异是骗人害国的“虚文浮伪”。^⑧他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学习方法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学习西学的目的不够明确。他认为唯有使学西学者看到强邻窥伺、祸患方萌“大厦将倾”的危急局势,激发出如“不亟思讲求教育”,国家“势难自立”的迫切感,才可能从新学中得益。其标志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材蔚起,百废俱举,使中国“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⑨这样才能使国家独立,“勿为外人所侮”,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郑观应这种以学习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中国处于极为顽固愚昧的情况下,能够较早较系统地提出这个主张,应该说是先进的可贵的。

破“虚”立“实”,提倡格致之学

郑观应把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对立,归结为“实”与“虚”的对立是有见地的。他认为中学崇尚“时文”,空谈性理是为“虚”,西学讲求格致,注重科学则为“实”。他主张破“虚”立“实”,提倡格致之学。

他说:中国“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

-
- ①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5)卷一,第六页。
 - ② 郑观应:《教养》,《盛世危言》(5)卷二,第二五页。
 - ③ 邵作舟:《邵氏危言》,纲记·卷上。
 - ④ 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5)卷一,第十三页。
 - ⑤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5)卷一,第七页。
 - ⑥ 郑观应:《训子侄》,《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三一页。
 - ⑦ 郑观应:《答广东团防局李若农、叶兰台两先生论教养书》,《盛世危言后编》卷四,第一页。
 - ⑧ 郑观应:《训子侄》,《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三一页。
 - ⑨ 郑观应:《教养》,《盛世危言》(5)卷二,第二四页。

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①科举旧学培养出来的人“形同废物”，其废就废在“虚”字上。为师者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②师承旧学的青年，将毕生精力消磨于时文试帖之中，以致“髫龄就学，皓首无成”。即使“及第”高中，也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实在是最大的人材浪费。

郑观应指出，科举制度的出现绝非偶然，从秦焚书坑儒以来，“变先王之道以愚黔首，降至隋唐，又专以科目取士，束缚其民，笼络英俊，千余年来无敢或改”，其目的是禁锢人民的思想，使皇朝长治久安，“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但是，形势的发展断非“执类书几册所能虚拟”。^③所以他把旧学时文斥为“徒具虚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④依靠这种教育要达到国家富强，与“西人颉颃”，是“戛戛乎其难”的。

相反，西学包括天学、地学、人学。天学“以天文为纲”，而推衍出算法、电学、光学诸艺；地学“以地舆为纲”，而推衍出测量、经纬、种植诸艺；人学“以方言为纲”，而推衍出食货、商贾、工技诸艺。郑观应说，这些西国儒士无不讲求的格致之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都能“实事程实功”，在这里，他提出了区别“实”与“虚”的根本标志是是否“有益于国计民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中国开始发生和发展，客观上对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郑观应的理论正是反映了教育适应资本主义“实事”，发展资本主义“实功”的历史要求。

“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对事物进行分析，探索事物内部本质。这样认识事物的结果，必然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郑观应说，格致之学乃是“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⑤他认为“能明其

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⑥这种对科学是巨大生产力的认识，不啻是对封建主义下落后生产力的无情鞭挞、对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热情歌颂，也是对未来的憧憬与预期。

他认为西方强大是“强于学”，即强于格致之学，其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掌握了“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⑦；“有机器以代人力，有铁路以资转运”^⑧，自然能够富国强民，“普利于无穷”。俄国普设格致书院，日本也如是。中国与西方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由于没有象俄、日那样讲求格致之学，所以瞠乎其後。郑观应由此断言：“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⑨应该指出，郑观应对日本、俄国由落后变为先进的注视与研究，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如出一辙，但就时间而言，郑观应在前，而康、梁在后。

他建议仿照西方程式，广科目以萃人材。文、武学校各分大、中、小三等，分别设于京师、省、府、州、县。高等文学酌分六科，即：格致科，包括声学、光学、电学、化学等目；艺学科，包括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等目；言语科，包括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等目；政事科，包括吏治、兵刑等目；文学科，包括诗文、词赋、牋启等目；杂学科，包括商务、开矿、农政、医学等目。武学分两科，即：陆军

① 郑观应：《道器》，《盛世危言》(5)卷一，第三页。

② 郑观应：《学校下》，《盛世危言》(8)卷二，第二一页。

③ 郑观应：《育才说》，《皇朝经济文编》第六册。

④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14)卷一，第二页。

⑤⑥ 郑观应：《教养》，《盛世危言》(6)卷二，第二五页。

⑦ 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5)卷一，第十三页。

⑧ 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5)卷四，第二七页。

⑨ 《西学》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盛世危言》(14)卷一，第三四一三五页。

科,包括枪炮利器、兵律、营制等目;海军科,包括测量、风涛、沙礁、驾驶、海战等目。^①

郑观应这种要求国家创设适应近代生产需要的各种学科,无疑是教学内容上的重大革新。郑观应提倡新学、格致之学,破“虚”立“实”,诚然是继承了明清以来学者要求研讨切于实际的学问的优秀传统,并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千年的传统旧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无情的嘲笑:读书多年“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向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②在破“虚”中带有很大的尖锐性与叛逆性;二是在立“实”中,引进西方知识与技术,以期“通当世之务,可以供国之用”,带有时代的先进性与资本化的品格。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③新学与旧学、“实”与“虚”的斗争,其实质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社会发展方向之争。

培养“实学”人才的若干建议

面对当时工作无效率,司事者畏葸因循、尸位素餐的现状,郑观应认为原因在于缺乏精通“格致”之学的“实学”人才,他忧心如焚地指出:不少“督办其事者素未谙习,遇有变故茫无头绪,惟有因循苟且了事;又恐大权为他人所得,故门户之见尤牢不可破,必至强不知以为知”,虽然有新技术新机器,但结果仍是“债国事而弗恤也”。^④

按清代的官制,取士虽已有科举、保举、恩荫等几条道路。但依靠八股取士的科举,固然学用脱节,对现实问题无补丝毫,滥行封赏的保举制度也腐败不堪。后来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更为市井之徒、纨绔子弟钻营捐途大开方便之门。凡此数途均无法培养“实学”人才。郑观应目击当时在“部派”“扎委”“保

举”等等漂亮名目下,各部门成了亲戚故旧、裙带关系的汇集地。他不胜感慨地说:“尤甚者,则以奔竞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丐显要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⑤他还说:“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⑥,如果说这些人“坐领千薪”于业务一窍不通的话,那末“浮支冒领,挥霍私囊”颇为能干,“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此辈管理企业“犹不习操舟而泛于海”,“鲜有不愆事者”。因此,郑观应呼吁:“方今天下,人才为急”,必须赶快培养能“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的“实学者”。^⑦

为保证和加速人才的培养,郑观应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在取人标准上“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⑧

二、急设师范学堂,广育师资。因为日本之所以致强,固然由于刷新政治与水陆军的强大,但“其母则在学校,学校之母又在师范”。^⑨所以他提议“各省宜急设师范学堂、专门学堂,广育师资以备充各学堂教授。”^⑩教师必须才、德兼备,因为“范方则方,范圆则

① 郑观应:《考试下》,《盛世危言》(14)卷二,第一页。

② 郑观应:《学校下》,《盛世危言》(8)卷二,第二一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0页。

④ 《水师》附论,《盛世危言》(8)卷六,第四八页。

⑤ 郑观应:《公举》,《盛世危言》(14)卷五,第十六页。

⑥ 郑观应:《纺织》,《盛世危言》(14)卷七,第二四四页。

⑦ 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8)卷二,第三九四页。

⑧ 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5)卷一,第二二二页。

⑨ 郑观应:《致潘君兰史述马君相伯〈考察日本学务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三九页。

⑩ 郑观应:《上孙燮臣师相寄呈日本文部省教育时务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九四页。

圆,不善不可以陶冶。”^①他批评当时同文馆、广方言馆的华人教习,以能通英法言语文字及略晓几何、测量、算学,就“俨然为师,自鸣得意,叩以深微之学,茫无所知,若假以甄别之权,贻误不浅。”^②象这种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撤换掉。

三、设立专业学校。他说:“凡有一事,必有一专业以教之。”文则有文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学院,工则有技艺院,商则有商学院,欲为师者有师道院,此外还可设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等等。这样不仅学有专长,而且有利于发明创造。

四、“考取文凭,方准用世”。社会的前进,已对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课题。以水师为例,“凡夫战守、攻取、进退、枪炮、水雷、轮橹、驾驶、营垒、炮台、飞桥、电信”皆须精通;“天文、地理、推算、制造”皆须熟习。因此,他提出士兵不能直接升士官;要升士官,必须经过士官学校,教以必要的军事知识。^③同样,矿师、医士必须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须用律例。所有这些接受专业知识训练的人,都必须“考取文凭,方准用世”。^④而考试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⑤

五、“广为搜罗,因材器使,各展所长”。这就是说,如果在考题之外,还有人独出心裁,能制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便为其单独命题考试,破格录取。此外,在培养新人材同时,必须充分发掘,利用原有人材。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清政府先后派遣留学生二百余人,但这些人回国后,“无可位置,听其四散”,“供差者寥寥无几”,其中一些人还留在外国。他建议“广为搜罗”,使人尽其才。

六、留学。将深通中西言语文字的本国高材生,由国家给以经费赴各国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学成回国分任各事,届时“即可不用洋匠”,而自己“递相传授”。^⑥

郑观应猛烈抨击腐败的科举、保举、捐纳制度,提出培养“实学”人才的主张,无疑是正

确的。但是他不可能认识到这些制度恰恰是封建专制制度笼络文人学士、巩固其统治的杠杆,而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正是封建小生产方式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反映;不改变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实学”人才很难培养起来,即使培养起来,也很难展其才的。

对学生“导之以悟性”

在教学方法上,郑观应主张采用启发式。他认为人有“悟性”与“记性”,教者应该“导之以悟性”,让受教育者理解、领悟,而不要死记硬背。他说:“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童子听人讲笑话,“彼即入于耳,会于心,牢记不忘”,而若课以《大学》、《中庸》,则“罔然不知所讲”他以此为例,说明“导之以悟性”的重要性。

郑观应认为:“天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及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⑦所以他把读书譬诸自地登楼,也必须“循序而进”,打好基础,反对躐等,他要学生“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

郑观应对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事物的规律,也有所了解。他说:“盖能分别某类之异,此为学之始基;能分某类之同,此为学之进境”。^⑧知道煤与木“相歧”固然是认识有了“始基”,但知道“均能发火则相同也”,就是认识有了“进境”,有了“提

① 郑观应:《致潘君兰史述马君相伯〈考察日本学务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三九页。

② 郑观应:《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三页。

③ 郑观应:《学校上》,《盛世危言》(8)卷二,第二页。

④⑤ 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5)卷一,第二一、二三页。

⑥ 郑观应:《学校》,《盛世危言》(14)卷一,第九页。

⑦ 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5)卷一,第十三页。

⑧ 郑观应:《待鹤斋学校论》,《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二八页。

高”。他认为“学问之理,不但辨其异,尤当考其同”。^①“学问越增,越能分辨”。他主张教师应从规律的高度启发学生,例如学乐须使学生深明其理,这样虽遇新调亦易审音,“盖因胸有成竹,可以触类旁通也。”^②

郑观应不仅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而且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影响和作用。他说:“凡教人者道分二端,一由本至末,一由末至本。由本至末者因其理而造其物也,由末至本者,因其物而究其理也。”^③善于教书者,必然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他说:“君子教人两者兼用,或推而广之或引而进之”。^④这样,从实践中得出的理论是清晰的;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必然是得心应手的、举一反三的。所以他曾建议就工厂附设学校,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就局厂之机器,可即事以指授”,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

郑观应重视天资的条件,但更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要教育得法,可以补先天不足,使中才变为上智。因为“天资人力两者相通”^⑥,“天资既敏,无以教之,则人力未至,知识未启;有学问以济之,书史以浚之,则中才可以上智,所以陶淑涵濡不可偏废者也。”^⑦

郑观应很注重因材施教。他认识到由于人的地舆和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不同,学者本人又“积习相沿”“性情相异”,所以教导之法必须分别对待,“不可一律相绳”。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必须因人而异。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说:“同是耳也,辨六律、定五声不能妙于听矣;同是目也,混朱碧淆五色,不能妙于视矣。”同样受教育,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或脑中之明能精算学,而舌钝不能习语言;能娴口才而心浅不能知格致”,所以一切学问博览兼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说:“天下之事大抵不同,善耕者不必善织;能读者不必能商,但求一艺之精可为世用足矣。”^⑧这些话看来似乎是消极的,但其实质是积极的,其观点也是符合认识论的辩证

法的,因为强“不善织”者织,强“不能商”者商,其结果必然是不成功的。相反,因才施教,让其在“善耕”、“能读”的一面发展,就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不是积极的吗?

* * *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 西。”^⑨郑观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思想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在封建主义的、腐败的、沉闷的迷氛中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新鲜的、富有活力的空气,较系统地介绍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育内容,力主革新教育,加速培养人才,认为唯此才能使国家摆脱贫弱挨打的局面,甚至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但是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又交织着新旧思想的驳杂。他一面猛烈抨击旧的科举制度,把它比作万恶之源,表示深恶痛绝;一面又说,改革不宜太骤的话,可以“正科”之外特设“专科”,让封建主义的科举与资本主义的考试制度“并行不悖”。一面对旧学进行无情的讨伐,一面有时又表示“圣人百世之师也,教者必以正”,要将孔子作为人生的楷模。这是刚从封建主义脱胎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反映。但是这些缺点并不掩盖他的大辘椎轮、前驱先路的重大功绩。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①② 郑观应:《待鹤斋学校论》,《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二八页。

③④ 同上书,第二六页。

⑤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⑥⑦⑧ 郑观应:《待鹤斋学校论》,《盛世危言后编》卷二,第二五页。

⑨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